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

郑炳林
杨富学

主编

Series of Ethnic History
and Culture in Ancient Northern China

IMAGES OF AMITĀBHA AND AVALOKITE ŚVARA OF TIBETAN BUDDHISM

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

李 翎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 / 李翎著. --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1. 4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421-1859-2

I. ①藏… II. ①李… III. ①喇嘛宗—阿弥陀佛—研究
②喇嘛宗—观音—研究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9268号

书 名: 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

作 者: 李 翎 著

责任编辑: 刘新田 瞿广业

装帧设计: 马吉庆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 数: 324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21-1859-2

定 价: 28.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 730030 地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 <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 li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 葛慧 联系电话: 0931-8773271 (传真) E-mail: gsm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缘 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敦煌文献中除了汉文文献之外，还有很多非汉文文献，如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藏文等，特别是藏文文献以其规模大、内容丰富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涌现出一批以研究敦煌藏文文献而著称的专家学者，出产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他文献的研究也普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汉文少数民族史料的研究也同样成绩突出。汉唐时期敦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根据敦煌文献记载，这里生活的居民除了汉族之外，还有将近百分之三十是少数民族，主要有粟特、吐蕃、回鹘、于阗、达怛、吐谷浑、龙家、通颊等也生活在这里，而敦煌周边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南山、回鹘、于阗、唃末等，所谓敦煌四面六藩围，关于敦煌及其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研究有很多成果，这套丛书就是集中了课题组的部分研究成果，呈现给学术界，以便今后研究中参考利用。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



开放的产物，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基地，早在 1979 年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 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二期、三期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 2200 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发挥了引领研究发展的作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 1985 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 7 万余册，为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所、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

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科研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截至 2011 年，出站的博士后 6 人，毕业博士 67 人，18 人晋升教授（研究员），其中 8 人任博士生导师，24 人晋升副教授（副研究员），38 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10 余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1 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 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前后接收留学生 40 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 2 人，这些留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特别是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 120 多项，经费 1000 多万元。陆续推出了一批学术丛书，主要有“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吐蕃文献选辑”、“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



“法国汉学精粹”和“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丛书”等，正在进行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因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 一、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史
- 二、材料的选用、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 三、相关问题的说明

导论

上篇 观音像研究

第一章 六字观音像

- 一、引言
- 二、巴达恰利亚对《成就法鬘》中观音成就法的解释——名称问题的提出
- 三、《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真言曼陀罗相——造像问题的提出
- 四、问题的讨论
 - 1. 六字曼陀罗主尊的名称
 - 2. 六字曼陀罗构成样式
- 五、结语
 - 1. 主尊名称：六字大明王
 - 2. 曼陀罗图像 《大乘庄严宝王经》与《成就法鬘》分别代表着两个密法体系
 - 3. 成就法图像流行的原因：观音信仰的深厚基础、阿底峡大师的倡行



第二章 持莲花观音像

- 一、引言
- 二、持莲花菩萨像的类型
- 三、“莲花手”考辨
- 四、救“六道”观音的辨识
- 五、救“人道”观音的辨识
- 六、代表无量光的观音
- 七、结语

第三章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 一、引言
 - 二、像式系统分析
 - 三、结语
- 现存十一面观音像一览表

下篇 阿弥陀佛像研究

第四章 阿弥陀佛两种身形考

- 一、引言
- 二、一佛二身相——西方藏学家对无量光、无量寿身形的推定
- 三、文本考察——阿弥陀的两种身形、玄奘译本提供的无量寿信仰信息
- 四、图像样式的考察——二身分形在汉地的线索
- 五、结论——二身样式的确定及流行时间

第五章 关于藏传佛教造像特征的总结

- 一、造像法与造像样式
- 二、持咒供养像与成就供养像
- 三、文本与表现

附录

- 1. 引用文献
- 2. 观音造像仪轨文摘
- 3. 观音造像仪轨文摘原文
- 4. 阿弥陀造像仪轨文摘
- 5. 阿弥陀造像仪轨文摘原文
- 6. 本文图版的说明及相关出处

后记

图版

绪 论

- 一、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史
- 二、材料的选用、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 三、相关问题的说明

藏传佛教诸神，包罗万象，有显有密，有佛教、印度教也有苯教神灵，尤其是后弘期的密教，一开始就受到印度密教和周边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一些大师在弘法的同时，也将来源地本土的造像法、图像样式和供养传统带入西藏，如后弘期由古格王派出去学法的仁钦桑波^①在返回古格时带回了一些迦湿弥罗（克什米尔）的工匠，他们共同建造了许多寺院，在寺院里面布置了许多供养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今依然存留的托林寺及寺内壁画，这些壁画有着浓郁的克什米尔风格特征。另外，1042年应邀入藏传法的印度大师阿底峡，既带来了印

^① 仁钦桑波（藏：Rintchen-bzangpo，梵：Ratnabhadra，“宝贤”之意，958～1055），据图齐说法，仁钦桑波曾先后3次前往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和东印度，在那里居住生活了共17年。参见图齐《梵天佛地》第2卷“仁钦桑波和西藏佛教10世纪时的复兴”。Tucci: *Indo-Tibetica*, 1932—1941, 意大利文版，后由Uma Maima Vesci 将之译成英文，200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书名为《梵天佛地》



度当时流行的审美趣味，从而形成了噶当派艺术，也带入了观音六字大明咒的供养像样式，又传说他对度母怀有特殊的虔诚，因此西藏对于度母的供养传统也与他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前弘期和后弘中后期，汉传佛教对西藏佛教供养方式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如阿弥陀佛礼拜传统在西藏的盛行，明显的主要是来自汉地净土信仰的影响。因此藏传佛教图像的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印度佛教、印度教和汉地密教的诸多内容。

一、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史

西藏佛教图像方面的研究，是在藏学领域中，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推动下出现的，早期的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即爱丽丝·格蒂（Alice Getty）的《北方佛教诸神》、（*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这是一部初版于 1914 年、关于藏传、汉传两个体系佛教图像学的著作。其后不久的又一部图像研究著作，是 B. 巴达恰利亚（B. Bhattacharyya）的《印度佛教图像志》（*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于 1924 年出版，这部著作虽然讨论的是印度密教图像，但其中的许多样式是西藏十分流行的。因此这里回顾的是近 100 年来，有关西藏图像研究的重要成果，包括其中提出或解决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Alice Getty, *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Thire history and icon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格蒂《北方佛教诸神》

A. 格蒂的《北方佛教诸神》可以说是佛教图像研究的开山作之一。

格蒂的特点是区域性研究，他将尼泊尔、中国藏区、汉地、朝鲜、日本和蒙古，作为“北方佛教”系统提出，实际上是作了汉传佛教图像系统（包括日本、朝鲜）与藏传佛教

图像系统（尼泊尔、中国藏区、内蒙）的对比研究，这一点反映在他对造像的名称、样式上所做的描述。在描述一个造像类别下首先列有藏、汉、蒙、日的名称，然后是手印和标识（包括色彩），并说明在不同地区的存在情况与流行样式。在图像分类上，格蒂使用了“禅定佛”、“禅定菩萨”的概念，作为一个图像系统以区别于其他的佛、菩萨。但是他没有说明这个概念的来源。由格蒂确立的这种区域性研究和以“禅定”与“非禅定佛、菩萨”为系统的分类方法，对后来的学者影响极大，这种影响，在巴达恰利亚的《印度佛教图像志》中反映的最为直接。大约到了三四十年代的图齐，这种分类方法建立的图像体系才开始动摇，而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图像文献的不断公布，图像的分类与早期学者形成了明显的不同。格蒂的遗憾是，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到使用的梵文、藏文或汉文佛教经典的依据，这对于认同并引用他的图像学观点产生了一些障碍。

Benoytosh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Calcutta, 1924 B. 巴达恰利亚《印度佛教图像志》

巴达恰利亚的《印度佛教图像志》是佛教图像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成果，不同于格蒂的“北方佛教诸神”，巴氏的研究对象是印度的密教造像，主要是对现有遗存的辨识。图像研究工作首先是分类，这也正是巴氏著作的突出之处。图像的分类方法，巴氏沿用了他的前辈格蒂曾使用过的“禅定佛”、“禅定菩萨”概念，但不仅如此，他作了系统化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巴氏以“禅定佛”概念为思维单位，将佛教诸神分为三大块：禅定五佛、五佛的化现、独立的与五佛无关的神，实际上就是将佛教供养造像划分为两个系统：化身系统和独立神系统，他将这种思路贯穿在整个图像研究当中，使密教



图像成为一个多而不乱、有序的体系，在此基础上讨论每一尊神各种成就法的造像样式及组合关系。

同时还要提到他的另一个成果，《成就法鬘》的整理，《成就法鬘》，梵名 *Sādhana -mālā*，又作《成就法集》，编者、编纂年代均不详。系收集有关印度后期密教金刚乘（梵 *Vajra-yāna*）诸尊崇拜的成就法、仪轨等而成之丛书。内容包括三三昧耶王成就法（梵 *Tri -samaya-rāja-sādhana*）、金刚座至尊成就法优波提舍仪轨（梵 *Vajrāsana -bhawwāraka-sādhanopadeśa-vidhi*）、圣六字母大明成就法（梵 *Ārya -śaḍakṣarī-mahāvidyā-sādhana*）等 312 种，依诸佛、诸菩萨、诸尊之顺序编列之。此三百余种成就法中，仅五十五种存有作者名，共计四十二人。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文献，巴达恰利亚进行了开创研究，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完成了他的《印度佛教图像志》。并通过成就法作者年代最古者为瑜伽派之无着（310 ~ 390 年顷），最近者为阿巴亚卡拉笈多（梵 *Abhayākaragupta*, 1084 ~ 1130），判断该书可能最终完成于 12 世纪。20 年代末，巴氏对此书进行了校定并出版了梵文版本（*Oriental Series*, No. 26, 41. Baroda, 1925 ~ 1928），这是一部对于密教图像学研究十分重要的文献。其重要性体现在通过这部文献所集的成就法内容，对于密教图像的阐释不再仅仅是一种设想，它可以让我们从密法的特殊意义上考虑图像的构成原理。

巴氏的专著和校定的《成就法鬘》为后来学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30 年代图齐的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如观音、文殊、金刚佛等的图像研究。然而，在佛教图像研究中一些模糊的概念也正是出自巴达恰利亚对于《成就

法鬘》的解释，如“六字观音”、“莲花手”等^①。

Tucci, G., 图齐

三十年代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图像研究方面算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他在前辈整理的图像系统基础上，主要通过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如壁画、唐卡、擦擦上的图像所揭示的内容，来重建西藏佛教史。尤其对于“擦擦”图像的研究是他首创的。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七卷本《梵天佛地》^②和三卷本《西藏画卷》中^③。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充分利用了巴氏校定的《成就法鬘》和《印度佛教图像志》的成果，但对于“禅定佛”这一概念，图齐几乎没有使用，这可能说明图齐对于这个概念是存疑的，但他没有解释。由于图齐不是从禅定佛这个概念出发，所以在讨论图像时，就完全不同于格蒂和巴氏化零为整的“化身”系统的处理方法，虽然偶尔也会提到这个神是由某位神化现，但主要是从文化渊源和文化互动方面来解释佛像身形形成的原因。如对于毗沙门图像，图齐首先指出此神的护卫功能源于印度的地神和森林之神，他的服饰则带有鲜明的中亚文化痕迹^④。又如作明佛母，图齐说是源于印度的部落神，后来进入金刚乘诸神系统，作为阿弥陀佛化现的

① 关于这些造像的概念及样式问题，本文将在“个案研究”中进行讨论。

② 《梵天佛地》，*Indo-Tibetica*，1932—1941，意大利文版，后由 Uma Mairna Vesci 将之译成英文，*Lokesh Chandra* 编辑，1988—1989 年新德里 *Aditya Prakashan* 出版，书名为 *Indo-Tibetica*。

③ 《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本书只有英文版，罗马国家出版社出版，1949 年。

④ 参见《西藏画卷》第 571 页。



一个女神，并成为性力派的象征^①。而对于样式的变化，图齐考虑了密法仪轨对图像的规定，在此他使用了巴氏校定的《成就法鬘》。由于图齐的阐释方式，使其研究更多地带有理性的特点。他的分类系统，可以通过《梵天佛地》卷一的“擦擦”部分体现出来，基本是：佛、观音、菩萨、金刚乘本尊、上师、成就师，这种分类顺序图齐是唯一的，他既不同于格蒂和巴氏以“禅定五佛”为中心的图像分类系统，也不同于后来的学者以成就师和秘密本尊为首的分类方法。前者反映出图齐对“禅定佛”概念的怀疑，而后者并不是说图齐不了解藏传佛教“视师如佛”、密重于显的排列方式，这种分类方式反映出图齐尊重历史的态度。因为他的分类系统，是按照佛教造像的发展先后排列的，而不是藏传佛教成熟后，重师观念下，将祖师、秘密本尊排列类首的方式。而后者正是图齐之后，学者在分类方面区别于前辈之处。

图齐的研究中，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他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由于图齐主要是从文化渊源的角度阐释图像，因此他的研究方法是综合性的，主要使用了考古类型学方法、文献学方法，也最早使用了文字学（语源学）方法，结合历史背景和教派分布来辨识图像并对部分作品进行断代。其中对于大量各种语言文献的引证和考察，为后人提供了图像个案研究的线索，而对于某些特殊造像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如他最早对藏传佛教造像中无量寿、无量光二身分离现象进行了分析，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方向性的研究。

《大正藏·图像册》1—12册

严格地讲，《大正藏》的密教内容，属于唐密体系，但是

^① 参见《西藏画卷》第547页，图版148。

发达于西藏的藏密正是以传入汉地的成熟的金、胎两界，尤其是金刚界曼陀罗为主体，发展演变为诸多的供养神体系，从唐密诸神中，可以清楚地照看出藏传佛教中密宗神的原形，本人正是通过对《大正藏》图像册内容的了解，以及对图齐著作的学习深深认识到这一点的。一般学者之所以将唐密与藏密分割地对待，本人以为，一是对西藏密教体系缺乏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近年来对于西藏密教图像的翻译，在名称的用法上，误导这样一种认识，似乎唐密与藏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神像体系。其实不然，比如在《五百佛像集》中的花度母、香度母、灯度母、味度母、金刚钩母、金刚索母、铁链金刚母等，正是《金刚界曼陀罗》中的香、花、灯、涂、喜、鬘、歌、舞等“内四供”、“外四供”及“四摄”天女，同样，对于 Lāsyā、Gītā 的藏密式翻译，也误导这种分割认识，如在汉译密典中，Lāsyā 译为“金刚喜”，Gītā 译为“金刚歌”，对于一般的学者来说，很容易就知道，此二神属于金刚界曼陀罗内四供天女，而在藏传佛教图像中，更常见的是将之译为，前者是“持镜空行母”、后者是“奏乐空行母”等等，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不一而足，对于一般的读者来看，自然将之看作完全不同的两类神。本文将《大正藏·图像册》纳入藏密图像文献中的目的，在于说明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演进关系，即通过汉地的密教神，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藏密诸神的来源，切实明白唐密与藏密诸神体系，是相融而不是分裂的关系，同时提醒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诸神名称的使用和原始的宗教象征意义。

以昭和九年（1934 年）成书的《大正藏》12 册图像卷，收集了大量汉地、朝鲜流入日本的密教造像内容，其中系统的图像集分布于如下几卷：



第3册《图像抄》高野山真别处圆通寺藏本、心觉《别尊杂记》京都仁和寺藏本

第4、5册，兴然《图像集》京都东寺观智院藏本、觉禅《觉禅钞》京都劝修寺藏本

第6、7册《白宝口抄》高野山金刚三昧院藏本

第8、9册，承澄的《阿娑缚抄》

第10册，澄圆的《白宝抄》

这些图像集，基本内容一致，有大量重复，只是繁简不一。分类方式基本相同，按佛、佛顶、佛母、经法、观音、菩萨、金刚（明王）、诸天等来划分，少有分歧。

总的看来，这套图像志作的比较细，每一佛名列梵号、密号，也有简单的释名（名称事），然后列出相关的诸经（本文事），关于图像的内容称为“形象事”或类似的名称，列出反映图像的经文，以《阿娑缚抄》和《白宝抄》为详细，其他图集或重复或简略。

这些图集反映的密教内容相当于唐密的仪轨和图像，具有持明密教的特点，以上图像集都不具备藏密中最突出、最庞大的护法类体系（在天部，有个别称为护法，明确提到护法者，是《毗沙门宝藏天王神妙陀罗尼别行仪轨》失译：若有人求财求官求一切外诸心事，自念汝意满足…若不实者，我不名为护法天王，我必替汝堕阿鼻地狱。又提到护世：卷五《觉禅抄》毗沙门天法，安城门天王事（附军阵）：凡城门置天王者为护世……），这说明持明时期的唐密与后期盛行于藏区追求修行成就的持明成就密法之主要区别。也证实了史书关于印度佛教传入西藏的曲折经历和莲花生所谓的“降妖除魔”，即由印度一路收服苯教和山妖，并使之成为佛教护法，才使得佛教在西藏流布的记载。